

求
真
與
問
美

古典小說名著新探

人
民
出
版
社



求 真 與 問 美

古典小說名著新探

潘承玉◎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姚劲华

装帧设计：鼎盛怡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求真与问美：古典小说名著新探 / 潘承玉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9（2006.3重印）

ISBN 7-01-005120-8

I. 求… II. 潘… III. 古典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6719 号

求真与问美

古典小说名著新探

QIUZHEN YU WENMEI

GUDIAN XIAOSHUO MINGZHU XINTAN

潘承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2.25

字数：300 千字 印数：3,001—6,000 册

ISBN 7-01-005120-8 定价：2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122524 65250042



作者

简介

潘承玉，男，1966年出生，安徽桐城人，教授。先后求学于桐城师范、安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毕业、中山大学博士后出站。现任绍兴文理学院中国文学与古籍文献研究所所长、浙江省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辽宁大学兼职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古典小说与戏曲、明清诗文、地方文化。

在《文学遗产》、《文史》、《文献》、《红楼梦学刊》、《复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报》、《中山大学学报》、《华学》、《明清小说研究》、《中外文学》（台湾大学）《台大中文学报》、《中国文哲研究通讯》（台湾中央研究院）、《南大语言文化学报》（新加坡）、《国际中国学研究》（韩国）等境内外刊物发表论文60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新华文摘》全文摘要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摘要20多篇。出版专著多部，其中《金瓶梅新证》（黄山书社，1999年1月）被金学权威赞誉“是所有《金瓶梅》作者研究成果中逻辑最为严谨、推论最为精微、行文最为典训、结构最为周到的一种”；《清初诗坛：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7月），获得浙江省高等学校科研成果奖二等奖。获得浙江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浙江省社联第三届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5年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奖等各种奖项九次。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南明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姚劲华

装帧设计：鼎盛怡园

010-64037378

内 容 提 要

对我国古代通俗小说经典文本的研究由来已久，长盛不衰，前人建树至丰至伟；但仍留下许多学术悬案和空白，等待后人进行新的探索和填补。本书即系作者十多年来在这方面冷静思辨，发前人未发之覆的结晶之作。

第一编“问美篇”扩大探索五大名著，在传统方法和现代方法、文本与文化的统一中力辟蹊径，或旧题新证，或新题新说，有力澄清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主题、《水浒传》金批本的功过、《三国演义》与传统“重说”文化的关系、《封神演义》对传统儒家观念的反动、

《金瓶梅》的形象塑造与审美特色，以及《红楼梦》的命名、主旨和创作方法等重要问题，富于学术理性和美学才情。

第二编“求真篇”针对古典小说中成就最高、催生两大热门国学“红学”、“金学”的名著

《红楼梦》、《金瓶梅》而来，采用历史考据和文学考证、文献与文本相结合的策略，对《金瓶梅》的伪补本、成书时代、可能作者调查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籍、五四以后新红学赖以奠基的关键等一系列学术争议问题，作出全新分析，给出严谨睿智的裁断，并首次披露新发现的一批重要红学文献。

第三编“溯源篇”属古代通俗小说的发生学研究，探讨古代通俗小说的宗教起源，澄清最早的通俗小说集的本来面目，对通俗小说发生期的审美风貌加以宏观把握，并通过考察一个文学母题的演变揭示了古代通俗小说的文化意蕴和前后传承关系。

总之，全书在历史和美学的交融中，对古典小说名著研究的诸多热点问题暨古典小说名著的丰富文化内涵，进行了比较科学的创新论证，是近年来古典小说研究的新收获。

序 一

摆在我面前的这厚厚一摞书稿，是潘承玉君十余年来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辛勤耕耘结出的硕果。

我与承玉君初次相识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那是1999年秋，北师大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召开教师与新入学研究生的恳谈会。会上，有研究生提议，希望定期举办研究生的读书会 and 学术研讨会，互相交流学习心得与学术成果。承玉君听后，当即提出异议，认为每位研究生研究的对象不同，研究的兴趣不同，大家在一起漫无边际地讨论，能有什么收获呢？一言既出，全场愕然。会后，有的老师对承玉君的率尔进言不以为然，说怎么会有这么“傲气”的研究生呢？而我在内心里，却不禁钦佩承玉君的坦率与耿介。

后来对承玉君了解渐多，我才知道，承玉君当时提出异议，并非心血来潮，而是体现出一位已有所成的青年学者与其他初入此道的年轻学子之间，在知识、学养、见地等方面的明显差距。那时的承玉君已经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界崭露头角，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青年学者了。他从1992年开始，陆续发表了《长在男权主义粪土上的恶之花——平议〈金瓶梅〉女一号潘金莲》、《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三国演义〉主题再探》、

《飞辩聘辞客,说破三国梦——〈三国演义〉与传统重说文化》等十多篇学术论文,其中多篇被中国人民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复印(其中一年四次复印,创造了一个青年学者的转载纪录)和《新华文摘》转载,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论文以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为研究对象,或就学术界众说纷纭的疑案作出言之有据的裁决,或就学术界未曾涉及的问题发表论之成理的新说,表现出一位青年学者难得的敏感学术头脑和敏锐学术眼光。他重新论证《金瓶梅》作者为徐渭的专著《金瓶梅新证》,更被金学专家的百年学术史回顾论文评断为:“是所有《金瓶梅》作者研究成果中逻辑最为严谨、推论最为精微、行文最为典训、结构最为周到的一种。潘承玉关于徐渭说与黄霖关于屠隆说、卜健关于李开先说、许建平关于王世贞说,在当今《金瓶梅》作者研究成果中,可以并称为四大说。”该文并在评论大陆前辈金学家和港台金学家的贡献后,将潘承玉和比之年长十多岁以上、已经身为研究员、教授甚至博导的其他四位学者相提并论说,“中国大陆的卜健、陈东有、许建平、李时人、潘承玉等也堪称别具只眼的青年金学家,他们的考证、评析、考论、新解、新证,使得金学园林更加花团锦簇,成为中国金学宝塔十分耀眼的塔尖”(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论文《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徐州师大学报》2001年第2期)。可以说,跟与他同时攻读博士学位的其他研究生相比,潘承玉不仅在取得的学术成果方面远远走在前列,而且已经初步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学术风格。“傲气”是要有资本的,承玉君的确有相当雄厚的学术资本!

没曾料到,后来还有更令我吃惊的事情发生。在博士生开题报告时,承玉君并没有延续他积蓄多年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而是另辟蹊径,选择了清初学者卓尔堪及其《遗民诗》作为研究对象。一个新的学术领域的开拓,首先要求研究者有广泛的文

献阅读和坚实的知识基础。在学术上,承玉君一直是个有心人,他从读博伊始,就确定了由小说研究走向诗文研究的学术转向,并将目光锁定在明末清初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他充分利用国家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的有利条件,日以继夜地沉浸在浩繁的古代典籍之中,大量阅读第一手文献资料。因此,他在做开题报告时,就已经对卓尔堪的家世生平、《明遗民诗》的版本流传等提出了一系列值得考辨的问题,并构建了一个便于操作的论文框架。我在他的开题报告会上戏称,他的研究路数与研究兴趣与其说是属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领域,不如说更接近于“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领域。从此以后,以广泛而坚实的文献史料为基础,进行文学与历史贯通的研究,便成为承玉君独具特色的学术风格。在博士论文的撰写与稍后的博士后课题的研究中,这种学术风格愈益鲜明,也取得愈益显著的成绩。

当然,走向诗文的学术转向,并没有使承玉君降低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热忱。他在小说研究领域里,仍然不断有新作问世,而且视界愈益宽阔,思考愈益深入,论辩愈益细密。如本书“渊源篇”诸文,将研究的视角拓展到古代通俗小说的发生过程;“求真篇”诸文,则就《金瓶梅》与《红楼梦》的版本、文献、作者、成书年代等相关问题展开研究。这些研究不仅超越了单纯对小说文本内在意义的解读,而且进入了小说史的历史思考,体现出承玉君注重原始文献的搜集与解读,运用文史兼通的考证方法,已臻炉火纯青。即使是对小说文本自身的研究,承玉君也能运用更为宽阔的视角加以审视,如本书“问美篇”中《“总其全部之名”——从〈全唐诗〉意象看〈红楼梦〉命意》一文,仅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承玉君眼界之高和命意之新。世纪之交完成的这些学术撰论,连同承玉君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新著《清初诗坛: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揭示出承玉君学术研究的个性特征,即密切关注学术前沿问题,充分掌握原始文献资料,敢于

提出崭新的学术命题,并善于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解决问题。有点“傲气”,于为人或许是瑕疵,于为学却无疑体现出一种追求独创的精神。承玉君这种既敢创新说又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是值得大加提倡的。

承玉君《求真与问美:古典小说名著新探》即将付梓,嘱我作序。阅读承玉君的大著,我感到既欣慰又惶恐。欣慰的是承玉君十余年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终于有所成就,得以驰骋学坛。惶恐的是才人代出,后生可畏,我辈马齿徒长,能不加倍努力?生固有涯,学无止境,我愿以此与承玉君共勉。

郭 英 德

2005年7月5日

(郭英德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序 二

莺飞草长,万物竞妍。今年4月,我去绍兴参加“2005 海峡两岸越文化研讨会”。会议期间,绍兴文理学院的潘承玉先生告诉我说,他的一部个人论著《求真与问美:古典小说名著新探》即将出版。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并且由衷地祝贺他在学术研究中又取得了新的成绩。临别前,他又提出请我为他的这部新著写一篇序言,殷殷期盼着我的同意,这却使我十分为难。然而,中国有句古话说:“恭敬不如从命。”况且,他和我已有着十多年的交往,我也应该写点什么,以给我们的友谊留下一点小小的纪念。

说来还真有点话长。我和潘承玉先生的结缘,还得追溯到十多年前的一次偶然机遇。我自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一家学术期刊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收到的各种来稿和信件很多。一日,我从办公桌上的一大堆信件中拿起其中的一封拆读,原来是一篇来自外地的自发来稿,题目是:《发迹变泰——宋元明小说题材流变考察之一》。其时,我正迷恋于话本小说的研究,自然对这类文章很感兴趣,于是就认真地阅读起来,谁知一读就再也放不下手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篇文章我乃从头到底,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虽然它是一份打印稿,墨迹有时也不甚清晰,但文中对宋元明小说、戏曲中的“发迹变泰”作品的条分缕

析,以及对这类作品存在的社会基础、文化意蕴的阐述又是那样的精辟入微,尤其是作者的分类和模式认同方法很明显有着西方叙事学中的类分析特征之长,这在我当时所看到的论文中是很少见的,实在难能可贵。于是很快将它在我供职的刊物上刊出了。由此我也记住了这篇论文的作者——一个名叫“潘承玉”的年轻人,他来自长江边上、著名的九华山脚下的一所地方高校。

论文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潘先生自然很高兴,似乎也很感激我这个“伯乐”。在事隔不久后的某日,居然来到上海找我。于是我们就这样相识了。每当想到和潘先生的相识,我总感慨万分。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只要他是正常的、心智健全的,就必然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谁也不能避免。在这一过程中,有来去匆匆的过客,也有各种让你难忘的朋友。著名作家贾平凹说过:“朋友是磁石吸来的铁片儿,钉子,螺丝帽和小别针,只要愿意,从俗世上的任何尘土里都能吸来。”我当然不是“磁石”,而潘先生也非“铁片儿,钉子,螺丝帽和小别针”,我们走到一起的主要原因,无疑是共同的学术追求。而这一点,两人十多年来的生命历程已足可佐证。

潘承玉先生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的热情、直率、谦逊、好学和对友谊的看重和执著,常常使我把他视做一位人生路上不可多得的真诚的朋友,说得更准确一点,我不仅把他当做是一位真诚的朋友,而且是一位极为难得的畏友。举个例子来说吧。自我们相识相交以后,潘先生是一直对我执弟子礼的,每次见面,必恭恭敬敬地称我为“张老师”,这一点最使我忐忑不安。虽说我年长他近20岁,然而学问的多少并不是靠年龄的高低来衡量的。旧时代有所谓的“忘年交”,但到了新世纪,这种所谓的“忘年交”,已有了根本性质的变化。长江后浪推前浪,后生真正可畏啊!我敬佩潘先生对学术的不懈追求。这十多年来,他从长

江边来到海河畔,接受了著名的高等学府南开大学的熏陶,又投身于北师大的校园,攻读博士学位,然后风尘仆仆来到南国,在中山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再从名师……以他的扎实理论功底,又博采众长,在国内学术界已崭露头角的光彩,完全可以选择一所条件更好一点的著名大学从事学术研究。然而他却执意回到绍兴,栖身于鲁迅的故乡。这是为什么?我曾问过他。潘先生说,这里有着胜山美水,更有着学术发展的空间,在鲁迅的故乡,大有用武之地。正是由于他对学术的不懈追求,才使他在短短的几年中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学校名副其实的学术骨干,为鲁迅故乡的学术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读着这部即将出版的著作,我的心潮澎湃。如果可以用一个词汇来形容潘承玉先生的学术研究工作的话,那我一定选择“初生牛犊”这几字。所谓“初生牛犊”,这当然不是贬义词。因为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眼中,牛犊的形象是美好的。在我看来,它踏实、勤奋,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吃进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只知奉献,不计酬劳,为他人不知疲倦地耕耘不息,并付出全部的精力和心血。潘先生难道不就是这样在我国学术园苑中默默地不知疲倦地耕耘不息的一头“牛犊”吗?而说它“初生”,则是指潘先生的朝气蓬勃,充满生机和活力,在学术研究中,很少患得患失的精神负担,敢于向各种传统成说和旧规冲击,并且取得了可贵的成绩,初步奠定了学术地位。前几年,在一次《金瓶梅》研究的全国学术会议上,潘先生被学界直称为近年来涌现的学术“新锐”。请注意,是“新锐”,而非“新秀”。这“新锐”不就是与我说的“初生牛犊”是同一层意思吗?只不过是另换一种说法而已。

正如书名所标示的,这部著作的出版,记录了潘承玉先生在我国古代小说研究道路上“求真与问美”的执著步履。全书分为“问美篇”、“求真篇”和“渊源篇”三个部分。这三部分的撰论

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选题的产生都是源于学术的争议,也可以说是学术争鸣之作。由于人们认识的不同,学术中的歧见司空见惯,学术的发展正是在不同意见的切磋和争论中逐步取得的。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道理。然而,多年来,在学界常见的争鸣之风却不常有了。囿于种种原因,学者们对正常的学术争鸣似乎比较“感冒”。对同一个学术问题的探讨,常常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采取“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即使是开展争鸣,也是不痛不痒的说上几句;要么拼命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却根本提不出新的证据来论证,因此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指责别人歪曲原意,无中生有,甚至倒打一耙、栽赃陷害的都有。而一般的人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袖手旁观,直至躲得远远的看好戏,等等,不一而足。而潘承玉先生不是如此。他面对学术中的不同意见,不回避,不退缩,而是迎难而上,通过深入的研究,从而提出个人的一得之见。即使是面对学术权威或成说,他也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开展学术争鸣。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位学者的责任。例如,《重考佛、道教描写——〈金瓶梅〉成书时代新证》一文就属这类争鸣的文章。在《金瓶梅》研究中,其成书年代的求证是一个比较“热门”的学术课题,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吴晗先生提出“万历说”以后,世人不乏争议,迄今尚无定论。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金学”热潮中,除“万历说”外,学界还形成了“嘉靖说”和“隆万说”,三者相持不下。潘承玉先生积极参与讨论。他在对此三说作了认真的分析后认为,吴晗提出的从书中的佛、道教描写出发去探讨小说的具体成书年代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切入点,但是包括吴晗在内的研究者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不是全面地处理文本材料,而是有选择地处理对自己有利的文本材料,对自己不利的文本材料则取无视或淡化的态度,或者是没有把小说创作的客体和主体区别开来,而是简单地根据佛、道教描写频次和文字的多少,来确定作者的取舍倾向,或是

较少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而是将问题理想化、简单化,一厢情愿地、盲目地证己非人,殊不知人、己并非势不两立之物,造成在这一问题上的失察。潘先生在把《金瓶梅》全书中所有的佛、道教描写的内容用表格的形式一一胪列以后指出:这部百万余字的长篇小说“大致以第七十九回西门庆之死为界,整个作品的佛、道教描写,由外到内,出现了一系列极其显著的变化”。接着他又对此作了十分细致的分析,认为《金瓶梅》全书所写的时代,是佛教由长期失势转得势,而道教则由长期得势转失势的时代,而这一时代较为漫长,小说从开头到七十九回写西门庆之死以前的情节,大约创作于崇道抑佛的嘉靖朝,而七十九回后写西门庆已死的情节,则创作于崇佛抑道的万历朝,得出了关于《金瓶梅》成书时代的目前最新的结论。

我之所以拈出潘承玉先生的这篇撰论为例来略作说明,是因为它较好地代表了作者的治学风格。第一,与时下有些刚走上学术道路的青年人喜欢“标新立异”,大胆构建体系不同,潘先生的“求真与问美”是建立在十分注意学术的追源性,充分尊重前贤和时人的学术贡献的基础之上的。文章第一部分是“问题的回顾”,一一叙述了吴晗等人的看法,向读者介绍了他们的基本观点。我一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学术是建立在前人所创造的基础之上的。尤其是人文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更是如此。我们的研究,如果离开了前人的创造,就会寸步难行。强行“标新立异”,大胆构建体系,也不会成功。诚然,我并不反对在学术上的“标新立异”和大胆构建体系,而且鼓励人们要有这样的学术勇气和远大志向。我想强调的是,在学术上的“标新立异”和大胆构建体系,也应当尊重前人和时贤的学术贡献,尊重他们的学术劳动。而在进入学术命题的选择时,应对它的历史和现状有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再提出个人的研究心得,才是正路。可喜的是,潘先生为我们做

了很好的示范。第二,是对前人和时贤的观点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具体指出他们的学术贡献或是失察所在,并且剖析原因,查明心迹。上述文章中的第二部分“症结所在”正是这样做的。第三,提出个人的看法。这当然是撰论的主要部分。而个人看法的提出,需要史料或理论的证明,才能成立。第三部分“内容的胪列”中,潘先生列举了大量的例子,其目的就是力图凭借如此丰富的历史材料来求证个人观点的正确。接着的“考察和结论”,就是对这些材料的分析和说明。由于作者的观点建立在大量可靠的基础之上,且又对前人的贡献和失察作了认真的考察,所以立论的说服力很强,富有思想启迪的意义。——以上,我只是解剖了“这一个”小小的事例。而事实上,潘先生的绝大多数撰论皆具有这样的鲜明特点,这里难免挂一漏万,只是为了说明他的治学风格而随手举一例证而已。

在以往的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中,我一直有个想法,即全国大多数的研究者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几部著名的小说上,是否会造成学术资源的浪费?因为撞车、雷同,甚至是重复之例时有所见,因而我的关注重心不在这些一流小说,而在所谓的二、三流作品上,如宋元话本、唐人传奇、文言小说或是才子佳人小说,等等,对这种自觉的回避有时还自以为是。现在读了潘先生的论著,不禁对以前的想法似乎有了一点动摇。因为潘先生所关注的与我不同,主要是古代小说中的名著。这些名著,历经数百年的风雨冲刷,早已在民众中扎下了深根,成为我国小说的经典文本。在它们身上,积淀着中华文化的精粹,自应成为我们的研究重点。何况,这几部古典小说名著,差不多每部都存在着许多重大的学术悬案。看来问题不在对它们是否已经投入了过多的力量,而在是否有所发现和有所前进。在这一点上,潘先生同样值得我仿效。前已说过,在《金瓶梅》研究中,成书年代是一个热点,而作者问题同样更是一个难题。在迄今为止提出的五十余位候选名单中,尚

无一人在研究者中能获得共识。我对此回避之。而潘先生却冲进群去,写了一本论著,重申了《金瓶梅》的作者是徐文长的观点,并有许多新的材料力证此说。尽管这一看法还须提供新的佐证才能最终成立,但它在读者中造成的广泛影响却是有目共睹的,对推动《金瓶梅》的研究,尤其是作者问题的深入研究产生了有益的作用。本书中《轻轻而言,难免肤泛——近十年来〈金瓶梅〉作者研究新说四种检讨》等文,就反映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持续关注。再如,对《红楼梦》的研究,在我国早已成为一门“显学”,成果丰硕。不仅是“内学”,就是“外学”,也有了极速发展。我曾经在其间试过水,自觉水太深而鱼难观,早早罢手不干了。而潘先生不畏艰险进入城中,同样也取得了很优秀的成果。本书收入的“红学”撰论竟有七篇之多,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而且从学术质量来看,又几乎是篇篇珠玑,这一点真让我惊讶不已。这七篇文章,涉及到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有作者问题(祖籍)的探考,又有新发现的红学文献的述评,还有《随园诗话》涉红记载真伪的考订、《红楼梦》创作方法的讨论以及《红楼梦》意象与文学形象的溯源等等。从研究方法上说,既有社会文化学批评,也有神话原型学研究,真让人目不暇接,如行山阴道上。又如,《三国演义》的主题,言人人殊,至今已有十余种观点,每种却又都言之凿凿,谁也说服不了谁。潘先生却另辟蹊径,依据小说文本大量材料的支撑,独抒己见,提出“天命说”,让人眼前一亮。类似这样的例子,在书中触处皆是,用不着我再在这里饶舌了。

潘承玉先生的小说研究,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关注,还和他的重在思辨实证是分不开的。这一点,在本书中同样显得非常突出。其中《最早的说话艺术底本——八卷本〈搜神记〉真相揭集》一文可为代表。此文讨论的是又一个学术难题,潘先生选择就此来作文章,以深化古代通俗小说起源时期的研究,实在是要有很大勇气和胆识的。在这篇撰论中,他原原本本地澄清了

此一问题的来龙去脉,深入揭示了八卷本《搜神记》作为最早的说话艺术底本的真相。其广博的学识,逻辑推理的能力,驾驭课题的水平,实证研究的功夫,一句话,潘先生的睿智和学术才情在此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这一点用不着我来再说,细心的读者是一定能感觉到的。古人重识,把它置于人的各项资质之首,是很有道理的。重在思辨,也即有识的表现。在学术工作中,我认为思辨是很重要的。只有多思深辨,才会发现问题,而发现问题则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工作。实证研究是解决学术难题的重要手段。而要做好实证研究,则须寻觅可靠的历史材料,在论证过程中,坚持让事实说话。重在思辨和实证研究的结合,是一个学者必备的学术资质。在这方面,潘承玉先生有着独特的优势。南北名校优良学风的沐浴,加上他的刻苦好学,已基本上具备了冲击一流学术的潜能。对此,我对他寄予厚望。

几个月前,我发表过一篇论文,题作《小说:一种文化》。我认为,从根本上说,小说作为文学的重要体裁之一,和艺术等一样,都是一种文化。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要运用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去作全方位的透视。近来,我比较注意于浏览海外学术的发展,发现在文学研究中,逐步引入文化学、哲学、艺术美学,特别是思想史的丰硕成果,似乎已成为一股流行的新思潮。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把文学史同思想史、文化史结合起来,能给文本的意义带来新的空间。当然,如果强调过分,也会造成文学自身特性的忽视,把文学变成文化的附庸,这也是我们需要防止的。这几年来,我在小说研究中,较多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例如,探讨佛教与小说的关系以及文学的古今中外演变和比较,武侠小说的文化特征等等,尝到了初步的甜头。现在再读潘承玉先生的小说撰论,突然有觅得知音般的惊喜。他的小说研究,也在传统的文学研究的道路上融入了文化的学说。例如,潘先生在阐述《三国演义》的思想意蕴时,提出了“重说文化”,对这“重说